

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向孙冶方等同志学习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向孙冶方等同志学习

86766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925594

为 振 兴 中 华 而 奋 斗
——向孙冶方等同志学习

*

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莱阳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84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00

书号3099·733 定价0.34元

在新时期中，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崇高典范，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 and 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学习彭加木、栾蓓、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孙冶方等同志的献身精神，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精益求精地掌握新知识，脚踏实地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自觉地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又红又专。

——摘自胡耀邦同志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

（原载1983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孙 冶 方 颂

雪 山 上 的 莲 花

《光明日报》记者 张天来

当我在夜深人静提笔写孙冶方同志事迹的时候，我从脑海里浮动的一系列形象中，最后选定了：雪山上的莲花。冶方同志的品格，多么象雪莲花啊！

我曾在巍巍天山海拔三千几百米的冰与雪的世界中，看到过雪莲花。什么花这样的高度都不生长了，唯有雪莲花在这里年年怒放，一张张薄得几乎透明的白色苞片，中间包着一颗紫色大球似的花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显示着在酷寒中不屈的品格。

—

雪莲花的品格之所以崇高，首先是因为它不畏惧艰难困苦的环境，能够顶着恶劣气候成长、开花。

那恰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一九六三年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的几名助手急得不

知道如何是好。原因是，孙冶方要到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去作关于利润问题的讲演。这次大会上，将要批判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孙冶方却说，他的主张比那位外国经济学家还要彻底些。几个年青人凑在一块儿商量，应该给冶方同志降降温了。到处在批判修正主义，理论界的风声也越刮越紧啊！

这天上午，两个青年人带着大家的意见，登门去探望孙冶方。他们焦急地对孙冶方说：“听说你下午要到学部去讲利润问题。我们看还是取消这次讲演为好。”

望着年轻人的表情，孙冶方早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等他们讲完，孙冶方耐心解释说：“这些年来，许多工厂不计成本，不讲价值规律，上缴利润很少，还有些企业靠救济过日子，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简单易懂的道理，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利润”这两字竟然象是洪水猛兽那么可怕。而在孙冶方的词汇中，这个词却闪闪发光。

“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年轻人这样劝阻。

孙冶方说：“我讲的是社会主义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区别，……这有什么错呢？”

“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年轻人感到不好劝说，但还是掏出了心里话：“不过还是不讲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

年轻人的担心，使得孙冶方有点激动了，他说：“风声

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看到两个年轻人仍然面有难色，孙冶方又说：“坚持真理是要冒三分险的，但这没有什么可怕！”

这天下午，无畏的孙冶方同志在大会的讲台上发表了他的讲演。

二

风声的确更紧了，然而雪莲花在漫天盖地的冰雪中，显得更加鲜艳悦目了。

一九六四年，站在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左”得出奇的康生等人，已经在暗中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一顶足以让任何人粉身碎骨的大帽子，戴在了孙冶方同志的头上。一次次的座谈会以后，矛头终于准确无误地对准了孙冶方。

在我的桌上，摆着一份已经发黄了的会议纪要的打字稿。我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听到孙冶方同志的雄辩而坚定的声音，我的心头充满着对于这位铮铮铁骨的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敬意。

“我主张资金利润率，也主张生产价格”，孙冶方开门见山，在众多的经济学家面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讲述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传统的意见认为资金利润率与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范畴，过去他自己也是相信这个看法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有了新的看法。“最近七、八年，我越来越感到那种流行的看法值得怀疑。”这种怀疑，反映

在他撰写的许多篇内部研究报告中，康生等人也正是根据这些报告把他打成“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而他却在这里宣称：“越是有人反对我，我越是肯定。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肯定：社会主义需要生产价格，需要资金利润率。”

在有人插话之后，孙冶方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资金利润率，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是为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繁荣开辟道路，不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孙冶方这样宣布自己为坚持真理而战斗的决心，“现在先搞点口头文学，反正有人记录。这次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就喜欢‘赤膊上阵’。”

他滔滔不绝地，直率而又雄辩地讲述着。

“我认为”，他最后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然而，准确无误的真理，被当作绝伦的荒谬。

坚持真理的革命家、理论家，被当作不可饶恕的顽固分子。

疾风中劲草更加挺拔，暴雪里雪莲更加顽强。

在多少次座谈会之后，要他最后表示态度的时候，孙冶方同志一言不发。

他坐在那里，象一座威严的雕像。会议上静极了，连好心人都在盼望孙冶方哪怕是说一两句客气话，然而他不肯吐一个字。

三

天更寒，雪更大，雪山上的莲花，被埋在了厚厚的大雪之下。然而，雪莲花并没有被压垮，并且为来年开放更鲜艳的花朵积累着各种养料。

在座谈会的批判之后，对于孙冶方的迫害升级了。这是一个很周密的计划，在高级党校批判杨献珍，在经济研究所批判孙冶方，是同时行动，同一个规格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经济研究所。一切正常的业务工作停止了。每周两次的批判会展开了强大攻势。没有多久，他的所长职务被宣布撤销。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孙冶方同志房间里的灯光还在闪亮。他在那里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他在那里撰写回击的文章。一九六四年的冬天，和一九六五年春天，孙冶方白天一声不响地接受斗争，晚上却一笔一划、字斟句酌地写，准备有一天拿出来应战。

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战性的文章，我在灯下反复地读着，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将近十八、九年前孙冶方同志在灯下奋笔疾书的动人场面。

我仿佛看到，他写下了文章的大标题：《要全面体会毛主席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

“我承认，我和批判我的同志，对毛主席所说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句名言的体会，是有出入的，而

且这是我和批判我的同志之间许多分歧的起点”，孙冶方由此开始了他的写作。

他表达了一个善良的愿望：“象目前这样，对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就价值法则所说的那两句名言的体会，为此众说纷纭，意见如此针锋相对（而且首先是在党员中间），我想是不能允许长期存在的。我希望能够在党中央直接主持之下，通过讨论（而不是通过武断和压服）把大家的认识迅速统一起来；然后，大家根据统一的认识来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思想。”

他写了一段又一段，一节又一节；他不断地修改、补充，力求有更大的说服力。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全部修改和补充完毕。然而，政治的风暴刮来，在撤职之后，他又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改造”。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他这份答辩文章就被埋在旧稿堆中去了。

让我们都记住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这一天吧。我国最有创造性、最有成就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革命家，被康生下令投入了监狱。

一间单身牢房的门被打开，看守人员命令他进去。他面对着的是铁窗和墙壁。伟大的恩格斯一百几十年前就曾经说过，一个人被关在单身牢房，只要两年以上，就会神经错乱；而我们的孙冶方同志，在单身牢房里整整度过了七年零一个星期。

别看他入牢前已是体弱多病，刚进牢房的时候却暴躁得象一头愤怒的狮子。他不理解，他不服，不想吃，不想睡；

他想跟下命令逮捕他的坏蛋把事情分辨个一清二楚。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要关押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而，没有多久，他冷静了下来。一旦心情恢复了常态，理智就统治了大脑。原来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他判断出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他给自己定下了两条：一不能自杀，二不能神经错乱。

从牢房里送进来窝窝头，他一口一口地咬，一点一点地嚼；他的目标是不让一丝一毫的营养跑掉。

放风的时候，他迈快步赶到院中，尽力多吸收一点新鲜氧气，多晒一小会太阳。

他这样顽强地生活，是为了坚持战斗；这种战斗，不是在出狱之后，而是从狱中开始的。牢房，成了他的没人打扰的工作室。没有纸、没有笔，不要紧。抗日战争期间，大家不是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么？在牢房中，孙冶方同志写书，就靠大脑，纸和笔都在大脑里。他把两眼一闭，大脑里的笔就开始在纸上写起来，一节又一节、一章又一章地写着他那部长篇巨著《社会主义经济论》。他整整写了八十五遍。他后来对人这样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形成的观点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

生平不说谎话的孙冶方，在监狱中第一次说了谎话。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他说要揭发、交代一个重要问题，多要了一些纸。结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的三万多字的文章，

向康生等人投出一枚重型炮弹。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坐在接他出狱的小汽车上，他第一句话就是对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写到这里，抬头向窗外望去，已时黎明时分，长安街上仍是灯火辉煌；然而我仿佛又到了巍巍天山的冰雪顶峰，看到了那冰雪世界中的光采夺目的雪莲花……。

（原载1983年1月16日《光明日报》）

铁 肩 担 正 义

《光明日报》记者 林玉树

铁肩担正义，

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

孙冶方同志在经济学领域里，有卓越的建树；他在保护知识分子方面，也创造了一个公式：我的观点+我的责任=保护被批判的对象。人们说，正是由于他勇于肩挑正义，才保护了经济研究所一批老中青经济学家，他是“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啊！

—

凡是经历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人，都会深深地记得，

那时大办食堂被当做新鲜事物广为宣传，“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争上游”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经济研究所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来自农村实际的调查报告，叫做《食堂报告》。

经济所曾经在河北省昌黎县设立一个点，做为研究农村经济的“实验田”。这个《食堂报告》正是研究人员在那里经过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由两位同志执笔写成的。《报告》列举大办食堂存在的七个方面问题，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农村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觉悟水平，造成了较大的浪费，违反了中国的国情！《报告》建议，在农忙时可办些集体食堂，或为单身汉办些食堂，但不宜在农村普遍办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反右倾运动中，这份报告却惹出了大祸！一位领导同志批示说：在对待食堂问题上有左、中、右，经济所的报告，是属于右的。上面要所里追查这件事情的责任。恰恰这个《报告》上送的时候，孙冶方并不知道。

那个时候，人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右派。《食堂报告》的两位执笔者紧张万分。然而，孙冶方却镇静自若。他找来《食堂报告》原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说，这个报告，以事实为根据，分析也符合实情，怎么能说是“右”的呢？这是个学术上的问题，怎么能拉扯到政治上去呢？如果照此办理，今后就无法开展学术讨论了！他不愿让别人受处分，不愿让别人受罪。他不愧不忙地召开党内会议，主动承担责任。

他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有的同志说：“上面要来打人的屁股，你就干脆让打，你想拦也拦不住。何况你又没看过呢！”

孙冶方说：“不！当时我要是看过这份报告，我也会同意上报的。”

同志们着急了，说：“你这么揽责任，要出事啊！”

孙冶方决定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这一天，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召开会议，讨论给《食堂报告》作者处分的问题。孙冶方在会上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上面批示在食堂问题上有左中右，讲的并不是政治上的左中右。我们应该弄清批示含义之后，再考虑怎样给人处分。”然而，批示是有大“来头”的，孙冶方没有保住两位执笔者。

两年之后，一旦政策许可，孙冶方就为他们甄别平反。他当面向这两位执笔者表示歉意。执笔者望着冶方同志诚挚的态度，心中非常激动：“老所长，我们怎么能责怪你呢……”

二

五十年代，孙冶方就探讨利润和价值规律问题。到六十年代初期，他打报告、写文章、作讲演，公开为企业请命，为利润恢复名誉。他认为，要是不讲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我国的经济就要被拖垮！

他是呐喊着前进的。于是，惹恼了康生、陈伯达之流。一九六四年，在康生、陈伯达的指挥下，开始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围剿。

在北京一次座谈会临近结束的时候，宣布第二次会议将批判经济所两位理论工作者写的有关价值、利润和生产价格的文章，要求大家准备意见。孙冶方忽地站了起来，说：“不必批判他们。文章观点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看到，他们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

他还没有等“大批判的烈火”烧到自己头上来，就主动地引火烧身，以减轻别人的负担。

散会之后，一个被批判的经济学家和孙冶方正好走在一起，他悄声地问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报名呢？”

“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的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孙冶方毫不犹豫地回答。

短短的几句话，在这个被点名批判的同志心中掀起了波澜：解放前，他并不认识冶方，只是解放初期才同冶方在国家统计局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时，他知道冶方就是宋亮，知道冶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作风正派，心中好生钦佩。现在冶方作为所长又站出来为他承担责任，他忽然感到站在面前的这个瘦弱的学者，不是一个普通材料做成的人，而是一个刚正、真诚的共产党员！

果然，这次座谈会之后，孙冶方成了“众”矢之的。而原先遭到批判的那两名理论工作者，却降到次要地位上了。

三

一九六四年经济所正在开展“四清”运动，担任副学术

秘书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被打成了“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一天晚上，他迈着蹒跚的步子回到家里，爱人关切地问：“你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我心中明白，我没有错误。”他刚刚三十四岁，头脑十分清醒。

沉默……

然而，反右派斗争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他轻声地对爱人说：“现在我也说不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要有思想准备：用你一个人的工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天呐！没有什么错误……但问题十分严重……爱人的泪水沿着双颊簌簌地掉落下来……

究竟是什么事情，给这一家子带来这样的哀愁呢？

一九六〇年一月，孙冶方对副学术秘书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任特邀研究员。你的任务就是代表经济所同他联系，向他介绍经济学界的情况。

这个年青的副学术秘书，照办了。他定期向张闻天汇报情况，还同张闻天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五月，这位副学术秘书和所里几位业务骨干，一起参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写作提纲和书稿的讨论会。当时孙冶方和张闻天也都参加了写书活动。

有一次，张闻天到上海调查经济问题，在饭桌上碰到一个熟人。

熟人问说：“下一站，你到哪里去？”

张闻天答：“到湖南去看看。”

熟人说：“彭老总也在湖南，你们又可以见面了。”

这个谈话，很快被人写成“情况”，送到了这位副学术秘书的手上。他没敢耽搁，又放到业务副所长的桌面上了。可是，在“四清”运动中，这份“情况”不翼而飞。有人说，这是张闻天到湖南搞“反党串联”的罪证，你们没有上报，就是有意包庇！

当时，这位副学术秘书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孙冶方说：“我记不清是否看到了这份‘情况’。就是看到了，我也不会上报。那是饭桌上的闲聊，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由于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责任，副学术秘书和一些业务骨干，总算度过了这一关。但是，孙冶方自己却多出了一条“罪状”。

今天，孙冶方当年保护的那些业务骨干，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许多人回忆这段经历时，眼圈湿润了……孙冶方受尽屈辱，吃够苦头，要不是他，当年他们这些后生小辈，怎么能在运动中免受灭顶之灾，怎么能有个人和家庭的今天啊！

四

在学术界，有的人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视为“异己”加以排斥，而孙冶方长期以来，一贯地把不同观点的同志，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加以保护。

五十年代，有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来到经济所后，